

田野中国丛书

SERIES OF FIELDWORK IN CHINA

Editor-in-chief: Yin Shaoting

主编: 尹绍亭

# 民族影志田野集录

FIELDWORK COLLECTION OF VISUAL  
ANTHOLOGY

杨光海 著

YANG GU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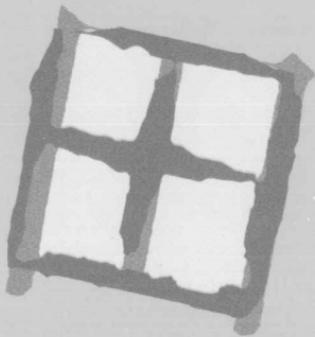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RPORATION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田野中国丛书

SERIES OF FIELDWORK IN CHINA

主编：尹绍亭

Editor-in-chief: Yin Shaoting

# 民族影志田野集录

FIELDWORK COLLECTION OF VISUAL  
ANTHOLOGY

杨光海 著

YANG GUANGHAI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RPORATION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总序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及其前后是其发足的时期。在国难当头灾难深重的时代，学者们颠沛流离，“中国之大已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然而就是在那样异常严酷的情况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开创者们凭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筚路蓝缕，锐意开拓，面向世界，立足本土，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这一段早期发展的历史，国内外相关介绍评论不少，其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已为人们所熟知。20世纪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人类学民族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取消。这一时期的人类学民族学者，不可能再从事西方学科理论及个人感兴趣的研究，也几乎完全断绝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他们所能做的，便是积极投身于由中央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活动当中。学科被取消，加之调查活动完全由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学术不具备独立研究的平台，所以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曲折低潮时期。然而其时大批学者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政治任务，不畏艰险，深入不毛之地，长时期住在乡村，认真访谈记录，仅就资料而言，无论从整体调查的广度看，还是从个人调查的深度看，比较今天的某些民族调查和某些学者的田野工作，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然而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过于强烈，理论和观点局限于既定的教条，因此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大调查除了呈现给人们上百册的形式划一观点雷同的文本之外，人们完全看不到那一时代学者们的真实生动的田野经历、体验、情感、

思考乃至能够显现个性的研究，这不能不说这是极大的不足、缺陷、遗憾和损失！这就是人们对于那一段史无前例的少数民族大调查评价不是太高而且多有争议的原因。

1997年，中国民俗学会年会在昆明召开，期间宋兆麟先生与我应邀到云南教育出版社拜会何学惠社长和几位领导。宋先生与我提出策划出版一套“人类学田野调查随笔丛书”的建议，该社领导当即欣然采纳。此后我担任此丛书的主编，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抢救”50年代老一辈学者们的“田野财富和遗产”。这一想法得到了前辈学者们的赞赏和支持，李绍明先生便曾说：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数十年过去了，时代变了，政治清明了，学术自由了，不必再背负包袱和带着假面，可以用新的理论、观点、方法重新整理、发掘、提升过去的研究，也可以用比较自由的随笔的形式书写昔日田野难忘的往事、工作、事件、过程、感受乃至逸闻趣事，这既是个人的生命史，也是贵重的学术资料和成果，其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丛书的主旨确定了，起始阶段的组稿工作也比较顺利，一些前辈学者热情颇高。不过后来的情况却出人意料，几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不幸先后辞世；几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先生虽心有余而力不支，难以再提笔写作；年纪稍轻一点的，或因病魔缠身无法工作，或因资料散佚无所凭藉，或因离开学坛久远终致兴趣全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晃十年过去了，前辈们完成的书稿仅为六部，加上拙著，一共七部，远未达到原定的目标，令人多少有些失望。不过经历了这么长的组稿过程，我深知人生短暂，沧海桑田，能够获得前辈学者的六部书稿已属不易。六书的作者分别是杜玉亭、宋兆麟、杨光海、蔡家麒、王国祥（孟翔）、杨毓骥。其中宋兆麟先生写泸沽湖畔的普米人，资料来源于他于1963年、1980年和1981年对云南宁蒗县、四川盐

源县和木里县的田野调查。蔡家麒先生的田野作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调查对象先是甘肃青海的保安族和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后是云南的独龙族、景颇族、汉族、彝族和傈僳族等。王国祥（孟翔）先生的田野工作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50年来他一直执著于傣族、布朗族以及克木人等的调查，此次他加盟的著作，是对克木人的专题调查研究。杜玉亭先生1958年开始从事民族调查研究，现在虽已步入古稀之年，然而每年仍然坚持长达数月的田野调查，其书是他50年田野研究和学术成果的总结，他将其视为“盖棺之作”，为此倾注心血之巨自不待言。杨光海先生可以称为中国民族电影拍摄的第一人。其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他为中心的摄制组拍摄佤族、苦聪人、独龙族等民族志电影的经历的记录。杨毓骥先生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对象为滇西北和藏东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其资料积累较多，此次提供的文本主要着笔于独龙族和藏族。笔者从80年代初期从事田野调查，迄今20余年，拙著是以十年前出版之《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加以后10余年的跟踪调查资料（图片）合并而成，为刀耕火种及其变迁的专题研究。拙著能忝列于前辈们的大作之中，实属荣耀；至于由作为后生的笔者担任丛书的主编，虽然有悖常规，然而能为前辈服务自当义不容辞。

就在本丛书组稿的十年间，山东、北京等地的出版社捷足先登，冠以“田野随笔”和“田野实录”之名的几套丛书先后问世，不过丛书的规模都比较小，原因不用说当为稿源稀缺之故。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无论哪位主编和哪家出版社，欲策划全面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规模田野调查丛书的计划并付诸实施都是不现实的。由此看来，本丛书规模虽小，

然而仍能以前辈学者的著作为主，某种程度上还是体现了“抢救特殊文化遗产”的良苦用心。也正因为如此，这套丛书也才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笔者在编入此丛书的拙著的“后记”里写着这样一句话：“于我而言，云南教育出版社可谓是一块收获的‘福地’。”在当下学术著作出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该社的何学惠、李安泰两位社长和杨云宝副社长等领导能够宽容编者几近十年的“拖拍”，仍然信守诺言热情支持出版“田野中国丛书”，实属难能可贵！

在此谨代表丛书的几位作者，向云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以及为丛书编辑付出大量辛苦的黄敏先生、李旭先生和赵宝华女士等致以衷心的谢意！

尹绍亭

2008年5月28日

识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

702研究室

## 序

《中国民族报》2007年12月21日，在一篇题为《光影记忆的少数民族社会》报导中，对《中国民族志电影》作了这样的评述：“新中国成立伊始，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亲自倡议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其间，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电影首次在中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田野调查中，这次拍摄工作是由中央政府推动的，有大批民族学者专家、摄影专家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参加。其规模之大、范畴之广、时间之久，中央及基层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之强，在国际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1956年至1964年，历时8年的“民族大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关于当时少数民族社会的丰富资料；而且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除《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外，那就是运用《光影记忆的少数民族社会》，通过电影记录手段，直接参与到民族调查的田野实践之中，对全国16个少数民族共拍摄21部（121本）社会历史科学记录影片。

这批具有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鲜明特色的电影，不仅为丰富和完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作出其他分支学科难以取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开创具有民族志纪录电影特色的新片种、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具有社会发展史“形象活化石”的第一手资料。当年，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佤族》、《凉山彝族》和《黎族》等影片后说：“搞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这些影片相继播放后，均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并深得国外同仁们的肯定与赞赏。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批运用光影记忆的少数民族社会的珍贵影片，其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将愈益显著。

无论是早期运用电影手段直接参与纪录少数民族的田野实践，还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持续用光影真实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变化，杨光海先生都倾其毕生心血与执著追求，以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畏艰险、无私奉献、忘我工作、出生入死的敬业精神，从东北边陲的黑龙江畔，到云贵山区的村寨；从塞外草原牧场，到海南五指山腹地；从大小兴安岭林区，到东海、南海之滨，几乎都留下他运用光影田野调查的辛勤踪迹，留下了他以生命和热情为民族志电影献身谱写的传世华章。光海先生在《伟大的起点——新中国民族大调查纪念文集》撰写的《民族大调查中参加民族志电影拍摄工作的回顾》一文，就是这一不平凡业绩的真实记述。

光海先生，1932年生于云南大理白族家庭，1947年初从大理到昆明，在子雄摄影室学习摄影，1950年考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195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纪录片摄影。参加拍摄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修筑康藏公路《战胜怒江天险》、《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等纪录片。1957年开始，光海先生参与拍摄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纪录影片，1960年调入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任编导摄影。1977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任电影组组长、编导、摄影师。

光海先生参加编导摄制的人类学影片和录像总计约30多部。本集收录有《佤族》影志、《苦聪人》影志、《独龙族》影志、《鄂伦春族》影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影志、《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贵州《苗族》系列影志、编写《基诺族》拍摄提纲、《赫哲族的今日渔猎生活》影志、《黎族民俗考察》影志、大理《白族》系列录像片、福建、浙江

## 《畲族》系列录像片、新疆《哈萨克族》系列录像片。

光海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人类学影片全部被德国、日本等国有关机构收藏，还被译制成英文版，广泛在国外传播。光海先生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实践和较早沟通中国影视人类学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也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在国际影视人类学领域中占有一席地位打下了基础。除影视作品外，他还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建树。

我与光海先生是在共同参与拍摄《独龙族》和《永宁纳西族阿注婚姻》两部民族志电影中相知相识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学术友谊，一直是在为促进我国民族志电影的发展、探索影视人类学理论建树、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以及如何培育新一代影视新人过程中建立、加深和发展起来的。除1961年一起在北京参加由文化部、中央民委、统战部、社科院民研所等所组织的“民族志电影审片座谈会”外，又合写了总结民族志电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努力摄制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纪片》。当然，最好的明证，就是彼此完好无损保存了100多封探讨影视学科建设与加深学术友谊的信函，这些近五十年的“鸿雁传书”，是由两颗执著为共同关爱事业的心所编织的“两地书”。虽已成过去，但穿过历史时空的隧道，却深深镌刻和铭记老一辈民族志影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忠心与赤诚。

光海先生是从旧社会一个相馆的学徒工成长为新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开拓者、奠基人，成长为受国内外学者尊重的资深摄影师和影视编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从他个人的成长发展史及其所创造的“奇迹”，既可映照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又可彰显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建设和发展轨迹。民族影视界同仁们说：他既是拍摄中国民族志电影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也是建立和发展我国影视人类学奉献终身的一位少数民族学者、专家，更可堪称为“中国民族电影拍摄的第一人”（丛书主编 尹绍亭语）。

能以一生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是值得我国各族人民永远敬重和怀念的。

能运用光影真实记忆我国兄弟民族社会历史，为人类文明遗产作出不朽贡献的电影艺术家，是值得世界各族人民永远敬仰与铭记的。

谨以景仰与崇敬的心扉向杨光海先生致以最诚挚的祝愿！再以欣慰和感恩的心情，为挚友光海写下以上这些心灵感悟，是为序。

刘达成

2008.8月于昆明书屋

目  
录

总序	1
序	1
《佤族》影志	1
《苦聪人》影志	14
《独龙族》影志	29
《鄂伦春族》影志	43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影志	53
《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	65
贵州《苗族》系列影志	76
一、方排寨苗族	80
二、施洞苗族的龙船节	94
三、舟溪苗族的芦笙节	96
四、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	98
五、苗族的工艺美术	106
六、苗族的舞蹈	111
编写《基诺族》拍摄提纲	116
一、基诺族拍摄提纲内容	117
二、基诺族的大房子拍摄提纲内容	131
三、基诺族的婚姻拍摄提纲内容	134
《今日赫哲族的渔猎生活》影志	140
《黎族民俗考察》影志	150
大理《白族》系列录像片	165

一、大理白族的名胜古迹	167
二、大理白族的建筑艺术	178
三、大理白族的雕刻书画和文献古籍	185
四、大理白族的工艺美术	190
五、大理白族的饮食文化和名优特产	194
六、大理白族的节庆活动	200
七、大理白族本主崇拜	206
八、大理白族的丧葬习俗	213
<b>福建、浙江《畲族》系列录像片</b>	<b>216</b>
一、畲族文化艺术节	217
二、福安县坂中乡大林村祠堂	223
三、霞浦县崇儒乡霞坪村祖图	225
四、福鼎县三垣田村做道场	227
五、畲族妇女的服饰头饰	229
六、霞浦县崇儒乡新村畲族婚礼	233
七、连江县潘渡乡南山村畲族婚礼	235
八、畲族的武术	237
九、祭祖学师	241
<b>新疆《哈萨克族》系列录像片</b>	<b>244</b>
一、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	246
二、哈萨克族地区自然风光与名胜古迹	257
三、哈萨克族的物质文化	261
四、哈萨克族的节庆与娱乐活动	264
五、哈萨克族的音乐舞蹈与艺术	267
六、哈萨克族的婚姻	270
七、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	273
八、哈萨克族的丧葬习俗	275

第一次出国赴德国弗赖堡	278
一、弗赖堡电影研讨会情况	279
二、在西柏林展映交流情况	286
三、哥廷根访问交流情况	289
第二次出国赴德国哥廷根	291
第三次出国赴德国莱比锡	297
在北京参加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302
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	307
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	311
人类学电影导演基础	317
一、导演如何研究剧本或提纲	317
二、导演如何写分镜头剧本	320
三、拍摄前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322
四、拍摄现场准备	324
五、实拍中导演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331
六、后期制作阶段导演的工作和技能	333
谈民族学影视剧本的编写（节录）	347
一、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立	347
二、结构	350
三、情节	354
四、解说词	356
后记	358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1
Foreword.....	1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Wa People</b> .....	1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Kucong People</b> .....	14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Dulong People</b> .....	29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Oroqen People</b> .....	43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b>	
<b>the A'zhu Marriage of Naxi People in Yongning</b> .....	53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Naxi Culture &amp; Art in Lijiang</b> .....	65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Miao People</b> .....	76
<b>Scripts of Ethnographic Film—Jinuo People</b> .....	116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b>	
<b>Fishing &amp; Hunting Life of Today's Hezhe People</b> .....	140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Investigation on Li Folklore</b> .....	150
<b>Log of the Ethnographic Film Series—Bai People in Dali</b> .....	165
<b>Log of Ethnographic Film Series—</b>	
<b>the She People in Fujian and Zhejiang</b> .....	216
<b>Log of the Ethnographic Film Series—</b>	
<b>the Kazak People in Xinjiang</b> .....	244
<b>First Visit to Germany—Freiburg</b> .....	278
<b>Second Visit to Germany—Goettingen</b> .....	291
<b>Third Visit to Germany—Leipzig</b> .....	297

<b>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b>	
<b>    Visual Anthropology in Beijing</b>	302
<b>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b>	307
<b>Taiwan International Ethnographic Film Festival</b>	311
<b>Anthropologic Film Directing Principle</b>	317
<b>On Ethnographic Film Scripts Composing</b>	347
<b>Postscript</b>	358

## 第四章 电影《佤族》的拍摄与完成

### 一、《佤族》影志

1957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托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三个民族的三部影片，即海南省黎族、四川省凉山彝族、云南省西盟佤族。影片的名称性质当时定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要求把当时的少数民族社会面貌如实地纪录下来，为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民族情况，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也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影像化的科学资料，也给少数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八一厂接受委托后，对拍好民族片十分重视，在本厂任务繁忙的情况下，抽调七八位业务骨干，组成了三个摄制组。我和郑治国同志是一个组，负责西盟佤族影片的拍摄。

1957年秋末冬初，八一厂副厂长夏川带领承担拍摄民族影片任务的三个摄制组成员前往全国人大民委办事处，接受全国大人民委负责人的接见。参加为拍民族片召开的座谈会，听取了民委负责人的讲话，他着重讲了拍片的目的任务，对摄制人员的要求和希望。他特别强调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要做到真实纪录，把各阶级各阶层的真实情况拍摄下来。并说，此行拍摄工作是很艰苦的，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

在全国大人民委负责人接见后，八一厂承担拍民族片的三个摄制组的成员都按分工做好各种准备，首先是摄影器材的准备和做胶片感光度试验等。

我和郑治国同志携带了两台电影摄影机，一个胶片箱和装有零星用具和衣服的皮箱出发了。从北京到云南，路途遥远，交通很不方便。先是乘火车到广西金城江，然后乘长途汽车到贵阳，再转乘客运汽车到云南沾益，再改乘小火车到昆明。乘车、候车时间加起来，需十多天。当时长途汽车的驾驶员服务态度都很好，知道我们是拍电影的携带东西多，也给妥善安排，还尽可能安排我们坐在靠近车窗的位置。一路上没有碰到麻烦。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当时拍部电影是难得的事，还带有几分神秘感！由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领导指定，谭碧波、徐志远同志参加佤族影片摄制组工作，谭碧波为顾问，负责影片内容方面的咨询，并写出拍摄提纲。当时全国人大民委的领导意图是明确的，就是给每个民族拍一部片子，因人力物力限制，只能逐步推开。但在编写佤族影片拍摄提纲过程中，谭碧波等同志设想选取佤族部分内容，并将景颇族的目脑节、独龙族的狩猎等等，选取各民族富有特色的内容，综合成一部片子，定名为《云南边疆民族纪实》。这个拍摄提纲的编写，需要一段时间，写好后，还要送到北京有关部门审批。为了不误拍摄佤族开春以后按时令进行的祭祀和农事活动，如“做水鬼”、“拉木鼓”、“砍牛尾巴”、“刀耕火种”等等，决定我作为先遣队先下现场，带一台摄影机，伺机进行抢拍。郑治国同志留下和谭碧波研究编写好拍摄提纲送京审批后而去。但我一人先行，身孤力单。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和云南省群众艺术馆领导洽商，借调搞音乐的陈致藩同志与我一同前往，由他携带录音机去进行录音，并为影片